

【秦鹏观察】后习时代中共向何方？杨小凯：死路一条



後習近平時代，中共將重回改革開放？結局，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早有預言：那樣只是S路一條！ | #秦...

Share Home



GAN JING WORLD

Watch Now

更新 2025-06-03 11:32 PM 人气 285

标签：习近平，中共，杨小凯，经济学家，红色资本家，秦鹏观察

【大纪元2025年06月03日讯】传闻中共政治局日前召开扩大会议，计划让习近平下台，重回改革开放之路。但是，后习近平时代，重启改革开放，中共能再次成功吗？

对此，我们有必要重温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一生传奇经历，也重温他二十多年前的惊人预言！思考一下，他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可能陷入一条“死胡同”。

杨小凯是世界经济学界的异端，从毛泽东亲自点名抓捕的囚徒，到最靠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，他不仅用超边际分析重塑新古典经济学，而且他也是国家发展制度论的先知，提出了“后发劣势”理论警告中国。

而他的预言，正在一一应验。

挑战红色资本家阶级 毛泽东钦定反革命罪犯

1948年10月6日，湖南长沙的一个高级干部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婴，他被取名杨熙光，乳名小凯。杨小凯的父亲是湖南省委委员，母亲是省工会副主任。在中共政权成立的红色热潮中，杨家是“革命精英”。小凯自幼聪颖，书卷气与领袖气质兼备，父母期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。

然而，1950年代末的政治风暴——反右运动、“大跃进”，让杨家感受到体制的寒意。这些早年的裂痕，也在小凯心中埋下了对社会正义的追问。

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席卷了中国。18岁的杨熙光就读于长沙市第一中学，他加入了红卫兵，成为湖南“省无联”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）的核心成员。这个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主张更彻底的革命，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。杨熙光以笔为枪，化名“杨曦光”，写下了一篇震撼全国的檄文——《中国向何处去？》（Whither China?）。

这篇文章从极左视角剖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，指出真正的对立面不是毛泽东与“走资派”，而是新兴的“红色资本家阶级”（中共干部及其家族）与广大人民群众。文章语言犀利，逻辑缜密，迅速在地下流传，数以十万计读者争相传阅。

它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思想火花，却触怒了最高当局。1969年，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杨熙光为“反革命分子”，他被捕入狱，面临死刑威胁。最终，他被判处10年监禁，而他的母亲因无法承受打击，于1970年自杀。

囚笼中求知 展现人性和信仰的光辉

监狱的10年（1969至1978年）是杨小凯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，但他并未被绝望吞噬，相反以惊人的毅力开始了自学之路。他借来破旧的书籍，自学英语和微积分，甚至尝试用数学分析社会问题。

一位狱友对杨小凯影响很深——一位数学教授兼虔诚的基督徒。他不仅教他高等数学，还以自己的信仰和人格魅力感染了他。他们在狱中讨论自由、真理和人性的意义，杨小凯的生命发生了重大的蜕变。他后来在自传《牛鬼蛇神录》中写道：“监狱让我学会了思考，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”

深刻的反思，让杨小凯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理性主义者。他开始质疑中共意识形态的狂热，认识到制度设计而非个人英雄主义，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关键。这段岁月磨砺了他的心智，也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。

重生与海外求学 超边际分析诞生

1978年，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杨小凯获释。为了淡化“反革命罪犯”的标签，他改回乳名“杨小凯”。在亲友的帮助下，他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吴晓娟（后改名Jean）。同年，杨小凯开始旁听湖南大学的课程，展现出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。

1979年，经济学家于光远发现了杨小凯的才华，将他推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。1980年，杨小凯移居北京。自此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。

1982年，他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，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88年，他完成博士学位，旋即接受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职位。同年，他移居澳大利亚，加入莫纳什大学经济系，开始了学术生涯的巅峰。

在莫纳什大学，杨小凯迅的研究聚焦于新古典经济学，特别是超边际分析（*inframarginal analysis*），这一理论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。他也因此名声大噪，1993年晋升为教授，并于2000年成为经济学个人讲席教授。

在代表作《专业化与经济组织》中，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框架，重新利用了分工的无形效应，被认为不仅现代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，还开创了其向国际贸易、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拓展。

他的理论受到很高的国际赞誉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·萨克斯称他为“世界上最具洞察力的经济理论家之一”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·布坎南更盛赞：“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学研究正在莫纳什大学进行，由杨小凯完成。”

敲响“后发劣势”警钟 提前20多年年预见中国走向

杨小凯的另一大贡献是“后发劣势”（*dis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*）理论，挑战了流行的“后发优势”观点。当时，许多学者（如林毅夫）认为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迅速赶超。然而，杨小凯在研究晚清企业和中国经济史后指出，技术模仿虽能带来短期增长，却无法弥补制度缺陷。如果没有民主宪政和市场化改革，技术驱动的增长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，导致腐败、官企膨胀和私企倒闭。

2001年，中国加入WTO，举国振奋。但就在这一年，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中警告：“中国若不进行制度改革，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，最终陷入深渊。”他在自传中写道：“真正的后发优势不是技术模仿，而是制度兴国、民主宪政兴国。”

2002年和2003年，他两度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他的理论不仅影响了学术界，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智力支持。

杨小凯从未忘记对中国改革的关注。狱中的反思，让他从极左派转变为民主宪政的倡导者。他呼吁去中心化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私有化，批评“科教兴国”的口号，主张“制度兴国”。他的勇气源于他的信念：没有制度的保障，经济增长只是空中楼阁。

信仰照亮新学术观 领悟现代化的目标

2001年，杨小凯的人生迎来转折。他被诊断出肺癌，生命进入倒计时。同年，女儿晓希被确诊脑瘤，却奇迹般痊愈，并在基督教朋友的见证下皈依基督教。

受女儿的影响，杨小凯开始反思人生。他在自传中坦言：“我曾是一个以事业为中心的人，忽视家庭，内心充满仇恨。”——当然我们都知道，他心中的仇恨价值观，应该是他自幼受到了中共思想的潜移默化。

杨小凯开始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。2001年夏天，他接受基督教信仰，第二年受洗加入英国圣公会。

信仰不仅带给他内心的平静，也影响了他的学术观。他在2003年的第二份见证中写道：“现代化的目标不应只是经济增长，而是道德和信仰的回归。”他开始质疑世俗的进步叙事，认为真正的幸福源于家庭和神。

未尽的回响 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世纪辩论

2004年7月7日，杨小凯因肺癌在澳大利亚去世，享年55岁。他的逝世震动了全球经济学界和华人知识界。

然而，杨小凯的影响却历久弥新。特别是他的“后发劣势”理论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，显得越发具有预见性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经济增长逐渐依赖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，私营经济面临挤压，腐败问题日益严重。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回望杨小凯的警告，感叹其洞见之深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杨小凯的人生和学术理论，并且将他的预言称为“一语成谶”，认为中国若不推进制度改革，可能陷入他所预测的“深渊”。

杨小凯的“后发劣势”理论，也持续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，尤其体现在林毅夫与张维迎的辩论中。这不仅是学术交锋，更是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深刻探讨。

林毅夫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始人，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。他倡导“新结构经济学”，强调后发优势，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模仿实现赶超。他以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功为证，指出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引导中的关键作用。

张维迎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，受奥地利学派（米塞斯-哈耶克）影响，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干预。他认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，认为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和腐败，扭曲市场激励。张维迎在2016年和2018年的公开批评林毅夫的理论，称“产业政策是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新面孔”，并以中国汽车、太阳能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为例，证明政府干预的低效。他特别引用杨小凯的警告，指出技术模仿若无制度保障，只会助长“官企膨胀”。

2018年11月9日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二人面对面辩论，吸引了百万观众在线观看。张维迎引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，批评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和腐败；林毅夫则以中国经济增长和13个成功经济体的案例，辩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。这场辩论被媒体称为“中国经济学界的世纪之争”。

最后谁赢了？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。

2020年以来，中国经济退去金色，显露出其本来面目。内部：房地产泡沫破灭、地方政府债务高企、人口老化、年轻人不婚不育大量躺平、贫富差距扩大，中国经济进入通缩。外部：中美关系持续紧张、全球供应链重建、西方国家对华技术限制不断升级，各国日

益认识到中共制度对全世界的威胁。政治层面：中共权力集中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，政府对民营企业加大掠夺、市场信心受到严重影响……

2024年，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杨小凯的洞见。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报告，中国最大100家上市民营企业的市值占比，从2021年的55.4%降至2024年6月的33.1%，而国有企业占比升至54.0%。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，2024年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估计仅为30%~34%，和2015年的62.1%相比出现了腰斩，这显示私企活力大幅减弱。

这些趋势，无一不印证了杨小凯的预测“官企膨胀、私企倒闭潮”。

世纪回响 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隐忧

2024年，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卢等三个人，表彰他们“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”。他们的核心观点是，包容性制度（inclusive institutions）——如法治、产权保护和民主——是经济增长的基石，而掠夺性制度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导致贫困和停滞。

这一理论，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高度契合，遥相呼应。

在2012年出版的《国家为什么失败》（Why Nations Fail）中，阿西莫卢还特别提到，中国若不推进政治改革，经济增长可能难以为继。这一警告，也与杨小凯20年多前的预言不谋而合。

■尾声：杨小凯不灭的灯火 能否照亮中南海的黑暗？

杨小凯的一生，宛如一盏不灭的灯火，照亮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坎坷与辉煌的路，也持续的书写着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
如今，中国站在政治与经济的十字路口。目前，越来越的传闻和怪异现象显示，中共元老温家宝等人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，联合发动了政变，准备让习近平下台，意图重回“改革开放”之路，解决经济停滞与社会不公的双重难题。

应该说，这对于终结习近平的倒行逆施、天怒人怨大有裨益。然而，杨小凯的洞见，就像警钟长鸣：改革开放若无制度保障，终是死路一条；经济自由若无政治自由为基石，终将崩塌。他的思想告诉我们，习近平后时代的中国，若要避免重蹈覆辙，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。唯有抛弃中共，真正的让法治与自由成为基石，中国才能走向真正的复兴。

对此，中南海新的决策者，如果无视这盏灯火，将难以走出黑暗。对此，他们会如何选择呢？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——《秦鹏观察》制作组

责任编辑：连书华#

相关专题：[中共分崩](#)·[经济败象](#)